

CONVERSATIONS
WITH
RUSSIANS

托尔斯泰卷

T O L S T O Y



Anatol Rapopor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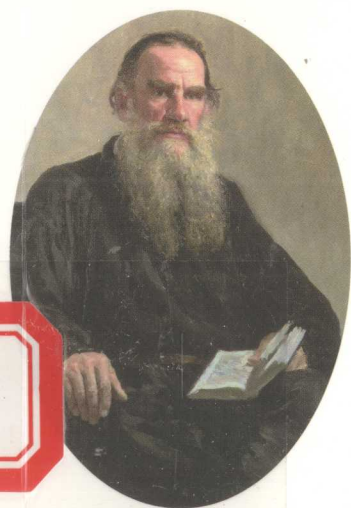
与俄罗斯人的 对话

两个世纪社会进化的系统论观点

[美] A.拉波波特 著

黄觉 唐云燕 高云 译

闵家胤 校



与俄罗斯人的对话

两个世纪社会进化的系统论观点

托尔斯泰卷

[美] A.拉波波特 著

黄觉 唐云燕 高云 译

闵家胤 校

漓江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与俄罗斯人的对话:两个世纪社会进化的系统论观点/(美)A.拉波波特著;黄觉,唐云燕,高云译;闵家胤校.——桂林:漓江出版社,2016.9

ISBN 978-7-5407-7870-5

I. ①与… II. ①拉… ②黄… ③唐… ④高… ⑤闵…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60601号

策 划:郑纳新
责任编辑:王红军
封面设计:李诗彤
内文排版:姜政宏

出版人:刘迪才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2
网址:<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55087201-833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山东省德州市经济开发区晶华大道2306号 邮政编码:253000)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16.75 字数:270千字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定价:58.00元(全二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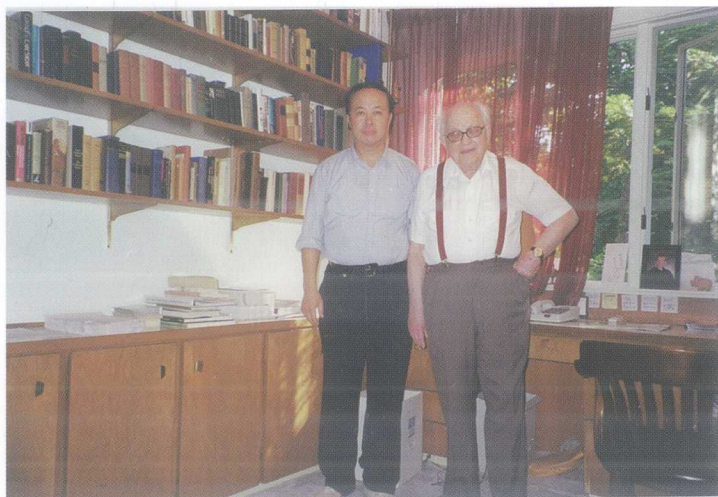
(电话:0534-2671218)



当时用相机拍下的池塘,为天鹅搭建的钢架子在水面中央,可惜被树枝遮挡,但仍依稀可辨。



A. 拉波波特晚年在加拿大多伦多郊外居住的独体别墅。



清晨,A.拉波波特已经完成了一天的主要写作任务——在后半夜同虚拟的俄罗斯亡灵对话。



2000 年,89 岁的 A. 拉波波特照例在入睡前弹钢琴。



2007 年,在人生的终点,96 岁的人瑞 A. 拉波波特还在演奏欧洲古典音乐。

(本图由 A. 拉波波特的长子 Mr. Tony Rapoport 提供)

中文版代序

阿纳托尔·拉波波特学述^①

闵家胤

20 世纪 80 年代初刚刚接触系统论的时候,我就知道“一般系统论”是美国理论生物学家 L. 冯·贝塔朗菲、经济学家 K. 保尔丁、生理学家 P. 韦斯和数学家 A. 拉波波特 (Anatol Rapoport) 在 50 年代中期创立的,还知道拉波波特是一位博弈论专家。

1986 年第一次到荷兰做访问学者,我在自由大学图书馆里初次读到拉波波特的文章,并且发现从 1956 年到 1977 年的 21 年间,他一直是《一般系统年鉴》的主编,由此推断他对创立和推进这门新学问贡献甚伟。

1987 年,我在告别荷兰自由大学归国的前夕,得知拉波波特最近出了一本《一般系统论》,便决定要组织翻译出中文

^① 此文原本为学兄牛志强策划的《世界犹太裔文化名人传》(正续两集)(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 年)撰写,现略作修改,以为代序。

版。得到加拿大友人、现在在瑞士兰德格巴哈伊国际学院担任院长的 H. B. 丹尼斯教授的帮助,我很快同在多伦多大学任终身教授的拉波波特建立了联系。应我的请求,他慷慨地放弃了中文版的版税,寄来了作者照片、小传和中文版序言,并且一次一次详细解答我们在翻译和校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这本书在 1994 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之后,我给他寄了五本,并附上一封感谢信——我原以为同他的交往就止于此了;没想到几年之后还有机会同他见面、交流并加深了了解和情谊。

2000 年 7 月,我应邀到加拿大瑞尔森多技术大学参加“系统科学 2000 年世界大会和国际系统科学研究会第 44 届年会”,此前我曾写信联系,得到拉波波特的欢迎——会后我可以到他家住一段时间,当面交流。

7 月 16 日上午,我同来自全球的 400 位学者和科学家一道端坐在瑞尔森多技术大学的学术报告厅里。执行主席宣布,大会由一般系统论四位创始人当中的唯一健在者 A. 拉波波特,和控制论三位创始人当中的唯一健在者 S. 比尔(另两位是 N. 维纳和 W. R. 艾什比)共同担任名誉主席,并请拉波波特致开幕词。一位老人蹒跚走上讲台,台灯的光线从下向上映照出他白皙清秀的脸庞,秃顶,两边稀疏的白发,一对极富吸引力的黑眼睛,目光从黑边眼镜框上投射下来——同我熟悉的印在《一般系统论》扉页前面的那张标准像非常相像,只是老了许多。

拉波波特开幕词的题目是《世界系统观念：一般系统研究的J（积分）标记》。他说，一般系统论的四位创始人共同关心用“系统”概念来整合人类知识，并用J（积分符号）作为一般系统论的会标。“整合”也是社会和政治的概念。只有在广泛合作基础上的整合才能使我们这个物种在地球上免遭灭亡。在致词的结尾处，拉波波特引用系统论另一位创始人、曾任美国科学促进会会长的经济学家 K. 保尔丁的一段话说：

“保尔丁区分出三种社会控制模式：威胁、交换和爱。威胁是专制和独裁的特点：做（或不做）这个或那个，否则你就会受到惩罚；这种模式的基础是对被统治者始终保持威压。交换是近代自由资本主义的特点：你为我做这个，我就为你做那个；这种模式的基础是人们直接的切身利益。爱是整合的全面合作的社会的特征。人们受到关心、照顾等，因为他们是社会的成员。”然后他接着说道：“我认为这三种模式代表道德的三个层次。交换比威胁道德，而爱又比交换道德。放到性关系语境来看，我认为嫖妓要比强奸道德，而一夫一妻制又比嫖妓道德。就政治语境而言，我认为民主资本主义要比极权主义道德，而民主社会主义又比民主资本主义道德。”这几句话言简意赅，讲得实在精彩。

在开大会的七天当中，我同拉波波特接触不多，很多时候他也没来——毕竟是 90 岁的老人了。最后一天，按照约定，我们一起参加了一个小型的研讨会，然后我就是他个人

的客人了。我们一起搭乘公共汽车回家。

拉波波特的家,给我的印象是位于多伦多市区的边缘,整个就是一个小型的森林公园。十几户人家,各人有各自样式的房子、花园、绿地以及房前屋后的树木。中间有一条环形的甬道,大树的浓荫笼罩着。见过他的夫人,喝过咖啡之后,他带我沿甬道走了一圈。这真是世外桃源,不但有鸟在林间飞来飞去,还有松鼠蹿上跳下。

“你们怎么把房子盖到公园里来了?”我不由得发问。

“不,”他回答说,“二十几年前,这里是市郊的一片荒地。我们先后到这里来盖房、种树、养花,渐渐地就形成这样一片森林住宅区了。最妙的是中间的这个池塘……”

我顺着他的手指向前看,透过一层层树叶和藤萝,可看到一池清水,有两个篮球场那么大,没有一点点受到污染的痕迹。夕阳透过树荫把粼粼的光洒在水面上,我不由得想起老年凯瑟琳·赫本主演的那部电影《金色池塘》。我们沿着池塘边的甬道走,拉波波特给我讲了一个发生在池塘里的故事。

原先,在池塘里一直生活着几只鳄龟。后来,这里飞来了几只天鹅。起初,它们倒也相安无事;等天鹅生了一窝蛋,争端就起来了——几只老鳄龟把蛋吞吃了。一部分居民怒不可遏:鳄龟太霸道了!为了保护天鹅,必须消灭鳄龟!另一部分居民争辩说,不,鳄龟是池塘里的原住民,恰如印第安人是美洲的土著;天鹅是外来的移民,恰如白种人到达了美

洲。倘若消灭鳄龟,就等于白人对印第安人实行种族灭绝。于是,园区的居民开了一个辩论会。争辩得出来的结论是:建一个乌龟爬不上去的钢架子,让天鹅在上面产卵和孵蛋,二者就重新相安无事了。

听了这个有趣的故事,我不由得想到,说到底,“民主”就是社会系统内的最佳选择机制,而政治则是妥协的艺术。用民主的方法解决问题,上面这个小小的难题不就很快找到最佳的解决办法了吗?达成妥协,不就又相安无事了吗?

说着说着我们走回了家。吃完晚餐,端着一杯咖啡,坐在书房的沙发上,拉波波特给我讲述了他的一生。

1911年5月22日,拉波波特出生在乌克兰洛佐瓦亚(Lozovaya)的一个犹太人家庭,该市位于顿河西岸。说到这儿,我们立刻有了共同的话题,兴奋地谈起肖洛霍夫的《顿河故事》和《静静的顿河》。他说,童年时代正值苏联内战时期,恰如肖洛霍夫小说里描写的那样。红军来了,学校关门了。犹太人重视教育,他一直由父母进行家教。犹太人受迫害,父母被迫带着他这个独生子,历尽千辛万苦,来到苏联—波兰边界。母亲先过河,到波兰那边找一家亲戚,说找到了再回来接他们。亲戚找到了,可是红军来了,封锁了界河,一家人只能隔河相望。好不容易挨到冬天,河面结冰了,父子俩假装滑冰。滑着滑着就爬上对岸了。还没来得及高兴,就听这岸的红军哨兵大喊一声:“回来!不回来就开枪了!”吓得父子俩只好乖乖地退了回来。晚上,父子俩正一筹莫展地

呆坐着，忽听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正是白天站岗的那两个红军战士。他们的意图很清楚：“是不是想过河？拿钱来，我们连夜护送你们过河。”父子俩喜出望外，当然是倾囊相赠。就这样，他们一家三口到了波兰，再辗转经维也纳到达美国。

1922年，11岁的拉波波特进了芝加哥一家公立中学。毕业后，父母又送他到维也纳学了六年作曲、钢琴和指挥。（说到这儿，他骄傲地告诉我，他88岁那年，还在多伦多市举办了个人钢琴独奏会。）1937年，拉波波特已经26岁了，才又回到美国，进芝加哥大学数学系。在四年内，他拿下了学士、硕士、博士三个学位。遗憾的是，毕业之日就是扛枪上战场之时——在通过博士学位答辩的第二天，他就应征入伍走向二战战场。1942—1946年，拉波波特在驻印度的美国空军基地服役，负责与昆明国民党空军基地的通讯联络。（说到这儿，我告诉他，那时我爸爸就在高山那边的昆明飞机场当机械员，给驼峰飞行的飞机做维修。）

二战结束之后，1946年，拉波波特35岁了，才开始教学、科学和学术的生涯。他先后在芝加哥、密歇根和多伦多大学任教职，20世纪80年代初曾到维也纳高级研究所任所长四年，然后又回到多伦多大学，现在则是这所大学的终身教授。与此同时，他还或长或短地在华沙、哥本哈根、柏林、日内瓦、维也纳、布拉格、波恩等地的10所大学做过客座教授。迄今为止，拉波波特已经撰写了19本书，为40本书写过文章，发表论文400多篇，获得十几种奖项和荣誉称号，其中包括楞

次国际和平奖、哈罗德·拉斯韦尔政治心理学杰出成就奖、一般系统研究综合成就奖。他的名字被 10 种百科全书收为词条。

拉波波特对四门学问都有开创之功或做出过重要贡献,它们是操作主义、语义学、博弈论和一般系统论。这四门新学问的专业辞书都专列词条,承认拉波波特是创立者之一。

操作主义(operationism)是科学哲学的一个流派,它认为,一个对象的概念,是我们通过操作所揭示的关于这个对象的可观察结果的观念之和。一个科学术语当且仅当它被操作地定义才是有意义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科学家工作实践的概括,并且相信科学至少可以逐步接近对实在的真实认知。拉波波特在这方面比较早地出版过两本有影响的书:《科学和人类的目标》(1950)和《操作主义哲学》(1953)。

语义学(semantics)是关于一个记号或一套符号的意义的学问。语义符号学关心语言表达方式的两个方面:指称和意义。语义学是语义符号学(semiotics)的一部分,另外两部分是句法学和语用学。拉波波特出版过一本书《语义符号学》(1975)。

拉波波特成就最大、成果最多的还是博弈论(game theory)这门新兴的数学学科。这门学科的理论基础,是认为每一个有理性的人的行动,在战略上都是为了将自己选择的功利或造成的后果最大化。博弈论就是要从数学上发现在这种处境中最合理的战略应当是什么。拉波波特在这个领

域代表性的成果是《战斗、游戏和辩论》(1960)、《战略和良心》(1964)、《二人博弈理论》(1966)、《N人博弈理论》(1970)。并且,他还做了很多工作把这一理论推广应用到心理、政治、道德、管理和决策领域。

拉波波特对一般系统论的贡献,前面已经做过介绍。我愿意在这里转述他书中的一则“小故事”。这则故事是在《一般系统论》这本书中,讲信息论里的“冗余度”概念时引用的,而所谓“冗余”就是不携带真实信息的“多余码”,说白了就是空洞的废话:

“在第三国际早期的一次会议上,一个中国代表做了一个小时的讲话,同时就由一位苏联官员逐句译成俄文。考虑到讲话这样长,而且那个苏联官员完全不懂中文,人们问他如何能做到这样。他的回答是:‘他还能说别的什么吗?’用信息论的术语讲,这一小时讲话的冗余度接近100%,因而其信息量接近于零。”^①

当年校译稿的时候,这段话给我的刺激很深,痛感背诵教条、只说套话和专讲空话早已是全球皆知的让人家当笑料的中国人的共性了。

我在拉波波特家里住了一个星期,通过大量的交谈,除了对他的学术成就有了全面的认识之外,还对这个犹太家庭

^① 《一般系统论——基本概念和应用》,第172页,[加]A.拉波波特著,钱兆华译,闵家胤校,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

和犹太学者的日常生活有了直接的了解。

拉波波特是个“早睡早起的百灵鸟”。他每天晚上 10 点睡觉,早上 3 点半起床,黎明前后的三个多钟头是他的最佳工作时间。中午他坐在沙发上读报,然后埋头做报上的迷宫或填字游戏——我相信这是博弈论专家的拿手好戏,他做这种练习肯定是为保持头脑的思维能力。晚上睡觉前必在钢琴上弹几首古典乐曲。家里藏书甚富,但是没有电视机——他的解释是,倘若有电视,孩子们就不读古典作品了。可事实上他的孩子都是五十上下的人了:儿子萨沙是个音乐家,早已成家单住;女儿列娜是个宠物医生,同老两口住在一起,总是早出晚归,牵着她的几条良种狗。因此,合理的解释应当是这个家庭对流行的通俗文化不屑一顾。

拉波波特说,他的祖国俄罗斯对他非常重视,曾多次邀请他去访问,给他出版的传记不久就要问世了。他自己正在写的书的书名是《与俄罗斯人的对话——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宁》。这本书他答应出版后要邮寄给我。为正在写的这本书,他曾邀我陪他到多伦多大学图书馆去借俄文原版《托尔斯泰全集》第 44 卷。在回家的路上,我表示愿意把他在系统科学 2000 年世界大会上的开幕词译成中文在中国发表,还建议他写一篇文章概述自己的哲学思想,同样由我翻译发表,好让中国人民对他有更多的了解。他欣然同意了。

接下来的两个晚上,他都坐在沙发上沉思,清晨都在书

房的电脑前紧张地写作,然后把两篇文章都下载交给了我。在后一篇文章《概述我的哲学思想》里面,他的思想很新颖并且值得重视。

他说,人类是有观念和运用符号的生物,当前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是由观念符号造成的;“集中体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标准是截然划分‘我们’和‘他们’,造成鸿沟的划分标准往往是某个观念,通常是使用煽动性的语言造成的,例如把‘种族’,或死死抱住的一种意识形态,或一种‘宗教’,或一个‘阶级’(往人头上简单地贴上标签来确定),或国籍,或性别,或诸如此类视为同类”。纵观全球,许多地方战火纷飞,争斗频仍,你恐怕不得不承认老人的话是有道理的。

短短的一周很快过去了。在告别的前一天,我专门到唐人街采购,然后下厨房为两位老人做了一顿四川风味的中国饭,作为答谢。拉波波特老两口非常高兴,把儿子一家和女儿都请来了。席间宾主交谈甚欢。

拉波波特说:“你没来之前,我只知道你是我的书的中国译者,现在我们是朋友了。”

我说:“中国现在重视知识产权了,我回去翻译发表你的两篇文章,需要解决版权问题。”

他说:“那好,我愿以一个便士的价格让渡中文版权,由你回国后全权处理。”我当即从钱包里找到一枚指甲盖大小的加拿大便士交给他。他郑重地接过去,放进了上衣兜。

我说:“我值了!用一便士买到了一个权威的两篇